

## 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ased on SSCI-indexed Journals

###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超语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基于 SSCI 期刊的分析

Yijie Wang<sup>1</sup>; Shuang Zhang<sup>2\*</sup>; Yue Jiang<sup>3</sup>; Chili Li<sup>4</sup>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China

Email: 1293828965@qq.com; 470046501@qq.com; 2201586627@qq.com; lichili@hbut.edu.cn

Received : 12 November 2024

Accepted : 3 January 2025

Published : 28 March 2025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Abstract

Translanguaging is one of the foci in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studies. Recently, there is a heat in learning Chinese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a. The present paper synthesiz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hotspots and future trend of research on translanguag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ased on SSCI-indexed journal articles sourced from Springer, Cambridge, Oxford and Web of Scien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1) there is an incremental trend in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hich falls into three stages; 2) there is no close tie of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space distribution with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ublin City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as the institutions that have the most publication number in this field; 3) a multiple hotspots were identified as follows: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nguag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ranslanguaging pedagogy and diasporic communit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global textbooks, cultural comprehension and language policy, and others; 4) the developing trajectory of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alls into the exploratory period, slow development period, quickening development period, and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5) the emerging keywords like bilingual education, diasporic community, language choice reflected the changes of attention to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se changes might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society and culture.

#### Keyword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Developmental Tre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nowledge Mapping; Translanguaging

## 引言

近年来，随着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汉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外语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学习汉语作为二语/外语/传承语的人数激增 (Li et al., 2021; Yue, 2024)。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和预测学科内外的各种问题，并对其进行预判、指引方向，提供相关的资源、策略和方案至关重要 (李泉, 2021)。基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语言学等理论的汉语二语教学，更注重形式、交际等方面能力，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关注不多(李雨桐,彭美淇, 2023)。汉语国际化的发展反映了全球多语和多文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汉语学习者的多元背景中，这一现象尤为显著 (García & Beardsmore, 2008)，留学生的多语和多文化背景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学习体验，也提出了对超语教学的需求，以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他们的语言资源，超语教学能够促进跨文化理解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使学习者在使用汉语的同时，灵活运用其掌握的其他语言，从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和趣味性 (Swain & Lapkin, 1998)。新形势下，国际汉语教师除了具备一般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素养外，还需建立起不同于母语教学的，针对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意识、国际意识和教学理念 (卢淑芬, 2014)。

超语 (translanguaging) 是近年来多语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兴研究热点，超语一词起源于威尔士，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有计划、有意识地在同一节课上使用两种语言，交替进行输入、输出活动，系统地建构双语教学模式。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兴起到最近全球的使用，超语的日益流行与多语教育发展方式的变化有关 (Lewis et al., 2012)。Cen Williams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威尔士语振兴教育中发现：当教师用威尔士语教学或要求学生们用威尔士语完成作业时，学生更倾向于使用英语，威尔士语振兴教育项目要求在课堂上只能使用威尔士语，但实际情况却是，教师和学生们都倾向于使用英语 (李崑,沈骑, 2021)。

由于研究的方法、视角和理念等不一样, *translanguaging* (超语)在我国被译成不同的名称: 跨际语(吴英成,邵洪亮,2014)、超语言技能(袁妮娅,周恩,2015)、跨言用(韩艳梅,2020)、超语实践(李崑,沈骑,2021)、超语行为(王俊菊,陈伟红,2022)、超语(罗隽昕,2024)等。本文将 *translanguaging* 译作“超语”。它既指教学活动中的多语教学模式,也指日常交际中,交际者们利用各种符号资源进行有效交际的模式;既是一种外显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基于多重话语实践的理论;既是一种多语、多符号、多资源融合的语言实践或行为,也是一个多语、多符号、多资源整合的语言系统(许红花,2024)。

李宇明(2023)指出,超语时代是对未来语言生活的一种描述,是语言桥梁作用充分发挥的一个新时代。自超语问世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将超语应用到语言教学之中,发表了较多相关成果。例如,García(2005)探究了超语视角下美国的双语政策与实践研究; Merrill Swain 用这一概念来描述语言学习中协商与产出有意义、可理解输出的认知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调节认知的手段和通过语言来产出意义、塑造知识与经验的过程”(Swain,2006);李崑(2021)以超语实践这一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可用于观察双语与多语使用者语言表达的分析框架。在国内,超语自被关注伊始,一直被国内学者视为外语教育研究的新范式,并开展了相关研究:超语缘起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探究(梁端俊,王平,2020);调查分析双语学生通过“超语”及“认同”来开展批判性学习的具体行为(赵焱等,2021);围绕理论超语和教学超语两大类,从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结合中国国情从超语研究和多语教学等方面两条研究路径进行剖析(郑咏滢,安宁,2022)。然而,关于超语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为检索,截止到2024年10月25号,仅有9篇相关文献(其中期刊3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5篇);以 Springer、Cambridge、Oxford 等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 SSCI 期刊为检

索，检索标准不包括书籍、图书系列、会议论文集、书评等，共计 61 篇。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不断增长的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迫切需求与有限的本土汉语课堂超语教学研究的不匹配, 启示我们要迫切探索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的应用潜力(李雨彤,彭美淇,2023)。鉴于单语主义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发展要求,为客观地呈现国际超语在汉语教学下的发展现状, 准确把握超语研究的发展动向, 本文拟采用研究综述的方法, 对国内外(包括中国、中国澳门、美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和德国)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的超语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梳理, 通过知识图谱、表格等呈现其热点主题以及发展趋势, 旨在全面、客观、科学、形象地反映这一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的基本状况、动态演进历程和前沿热点, 以期超语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以 Springer、Cambridge、Oxford 等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 SSCI 期刊作为研究综述的文献依据, 对超语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梳理, 以了解其现状其发展趋势。具体而言,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1)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超语研究发展脉络及空间分布情况如何? (2)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超语研究热点有哪些? (3)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超语研究的演进路径及发展前景如何?

###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6.3.R2 和 Excel 等工具对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分析, 运用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功能, 对知识图谱进行绘制, 能够对某领域的知识特征、热点进行直观的分析, 通过图谱能够对相关研究进行更为深入的科学可视化 (Chen, 2004)。CiteSpace 用于关键词共现与聚类、中介中心度以及关键词突变等分析 (赵应吉,董保华,2022)。将

检索得到的 61 篇“国际中文教育”有关文献导出，并以“download\_translanguaging”命名保存，之后用 CiteSpace 软件对该文件进行格式转换，然后设置相应的参数，从“作者合作”、“关键词共现”、“关键词中介中心度”等参数对其进行分析，以发现目前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等。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选取的 61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首先，从宏观数量上梳理了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整体情况；然后利用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度得出研究热点；同时利用时间线图分析研究热点随着时间变迁的变化趋势，以期较全面、客观、系统地呈现其的整体情况和发展趋势，为今后的超语在国际中文教学上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 研究结果及探讨

### 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空间分布

#### 发展脉络

文献发表数量是衡量一个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学科领域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脉络。

表 1. 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期刊发表数量年度统计图

年份	发文量
2013	2
2014	1
2015	1
2016	1
2017	1
2018	2
2019	2
2020	5
2021	8
2022	13
2023	8
2024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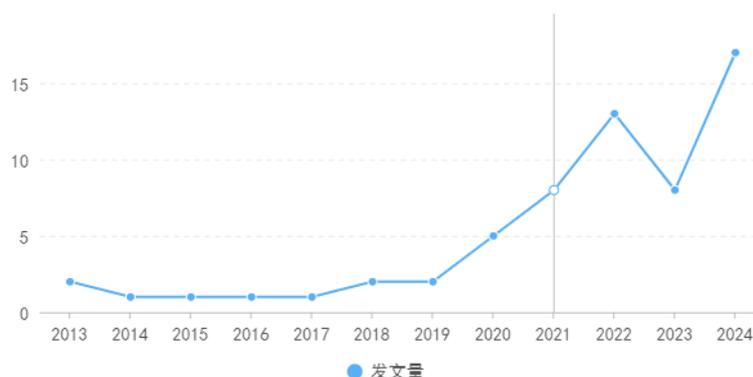


图 1. 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期刊发表数量年度分布图

表 1 和图 1 为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相关文献的总体统计情况。结合图 1 和表 1 来看，以 2018, 2021 为节点，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13-2017 年，该阶段为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在此期间，相关论文呈缓慢上升趋势，2013 年出现第一篇相关文献，在 2018 年达到 2 篇，整体来说发文较少；2018-2022 为第二个阶段，该阶段为迅速发展阶段，于 2018 年开始逐步上升，并在 2022 年达到此阶段的顶峰。2022-2024 是第三个阶段。此阶段在 2023 年有所回落，随后于 2024 年恢复增长，达到顶峰 17 篇。总体趋势显示，发文量在经历了初期的稳定和缓慢增长后，出现了快速增长和波动，尤其是在 2024 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这表明在 2024 年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我们注意到 2024 年文献只检索到 10 月，可以预测未来几个月还有相关的文献刊发。

## 空间分布

### 研究者及合作情况

将检索到的 61 篇文章进行导出成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 并运行，设置时间跨度 (Time Slicing) 为 2013-2024 年，时间切片 (# Year Per

Slice)1 年,对“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进行可视化,它能够显示研究领域内作者之间是否有合作、是否形成了合作团队以及团队合作程度等情况(图 2)。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图谱中的节点(也称为年轮)代表作者,节点之间如果有连线,说明作者之间有合作。此外,文献计量分析中常用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简称 S 值)来衡量聚类成员的同质性,数值一般在[0,1)区间;用密度(Density)来衡量聚类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陈悦等,2015)。研究者合作的网络密度(Density)数值小于小数点后四位(约为 0.0007),而且各节点之间联系不甚紧密,说明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研究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因其时间较短,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比较松散,没有形成良好的研究团队和有效的合作关系,研究人员呈发散分布,基本上开展独立研究,缺乏团队合作。

### 发文机构及空间分布

CiteSpace 软件用于可视化文献数据源,并在图 3 获得了作者所属机的共现图,如下图所示。



图 3. 作者所属机构共现图

结果显示在超语领域发文较多的机构有：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Dublin City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openhagen、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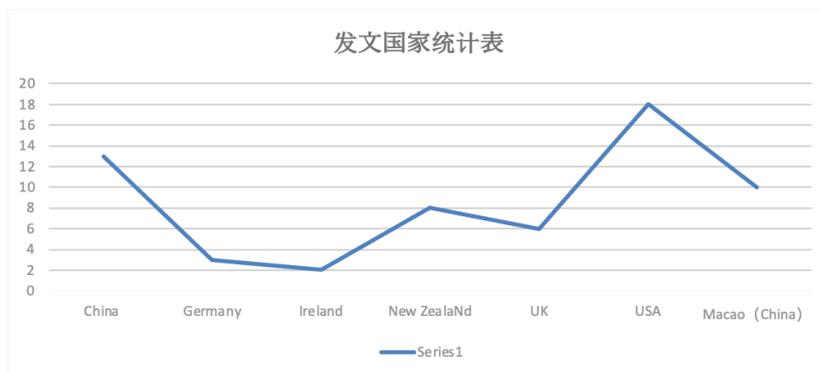


图 4. 国家发文量统计图

根据检索的文献生成的“国家发文量统计图”（图 4）显示，排在首位的是中国（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排在第 2-6 位的分别是美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和德国。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的超语理论研究的主要区域。这些区域多民族、多种族共生共存，语言接触频繁，多语现象普遍，为超语现象的产生提供了语言环境，也为超语问题的探索创造了语言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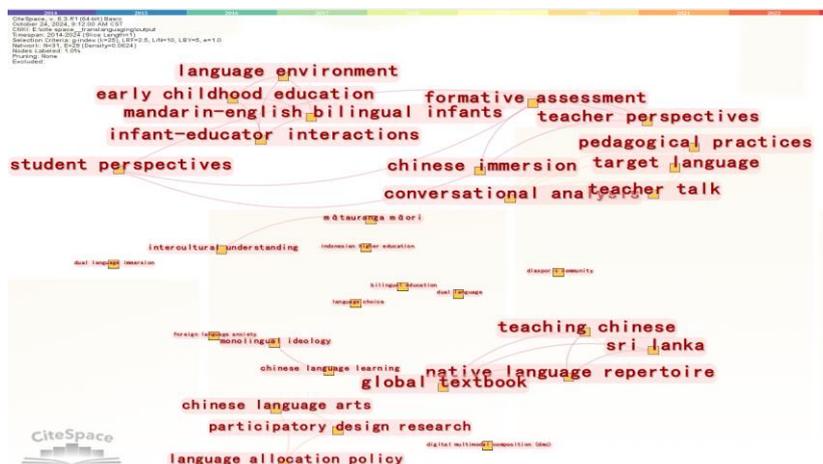


图 6.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 2. 关键词聚类标签 (LLR)

聚类序列号	聚类大小	S 值	代表性关键词
#0	11	0.962	dual language learner、big date、language impact 、career、head start 、children
#2	9	0.881	science classroom: achievement、coping strategies、language policy、language challenges、Chinese textbooks
#3	6	0.791	motivation:、adult、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orientations、computational modeling、meta analysis
#4	7	0.941	practice、ideology、teachers perception、language orientation、lecture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7	4	0.885	Chinese English trilingual、writing system 、functional connectivity、natural mechanism

表 2 是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中提取的关键词聚类标签，表中“聚类序列号”所对应的聚类与图 5 相照应。由于各个聚类及代表性关键词内容有重复，因此表中仅体现规模较大和体现不同类型的主题 #0、#2、#3、#4、#7 共 5 个聚类。结合图 5、图 6 和表 2，我们对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标签整理分析，将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归纳为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超语教学与散居社区、中文教学与全球教材、文化理解和语言政策的研究。

### 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

超语 (Translanguaging) 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语言使用者在交流中动态地使用自己的全部语言资源，包括不同的语言、方言、语言变体以及非语言行为等，以实现有效沟通。其在国际中文教育、汉语教学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教师和研究者们采用了超语的教学方法，不再局限于使用单一语言，而是让学生利用自身的语库进行意义建构。超语已在相关领域得到了应用与拓展，尤其是与它关联最密切的语言教育领域，通过超语的教学方法，打破了不同语言的界限，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界限，语言和其他认知、模态和符号的界限，从而促进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李巍,沈骑, 2021)。

在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实践中，超语也被应用于文化教学。通过使用国漫等艺术媒介，教师可以构建高质量的超语文化课堂，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多模态话语的运用，实现国漫与学习者的良性互动，同时在情感培养上，利用国漫展现中国形象，传递民族精神与文化情怀(卢晓晨, 2024)。超语还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在数字化交流、新媒体交流中，人们创造了许多新的表达方式，包括汉字和英文或其他文字的混杂表达(Zhang et al, 2024)。

超语可以分析这些新造字词的结构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等含义，以及与语言政策、语言价值、语言态度和语言观念等的关系。超语的应用、发展与展望也是超语在中文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Tian, 2024)。研究者们还对超语与语言教育、语言应用和人类认知与语言的理论模型的主要贡献进行了探讨，并讨论了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和未来发展方向 (李巍,沈骑, 2021)。

## 超语教学与散居社区

继 Garcia 对美国具有西班牙语背景的“双语”少数族裔儿童社区的研究之后，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双语或多语课堂内的超语教学研究 (Zhao, 2022)。这类研究在双语与多语学习者的参与度、融入度等方面关注较多，主要尝试解决“社区”语言在儿童学习中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主要以语言民族志研究为主 (Garcia & Kley, 2016)。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家庭或社区语言的使用对儿童的学习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现有的研究都表明社区语言能够促进学习，科研帮助学习者获得信息以及对概念的理解，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社区语言”和语言变体对知识建构、信念的获得等因素都会起到正面影响(李崑,沈骑, 2021)。

## 中文教学与全球教材

随着中文作为外语的需求增加，全球化教材在不同国家的中文教学中被广泛应用。全球汉语教材库提供了丰富的汉语教材资源，涵盖了 40 个国家、57 种教学媒介语，这个平台不仅包含了教材的基本信息，还提供了多路径检索、样课预览等功能，为全球的教师、学生、研究者等提供了便利。然而，这类教材往往缺乏对本地文化和语言背景的敏感性，导致学习者的语言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研究显示，全球教材在文化表现上存在不平衡，尤其是对南亚文化的忽视，这种文化偏见可能导致学习者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理解不够全面，影响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Song, 2024)。

传统的单语教学方法在中文教学中仍占主导地位，教材往往强调目标语言的纯粹性，忽视学习者的母语和多语言背景。在教材设计方面，多语言和多文化的融入有一定的欠缺，只有通过超语教学模式，在多语言、多元文化的视角下，才能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帮助学习者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不仅能够促进语言学习，还可以增强了学习者的文化意识。教材呈现多样化特点 国际中文教材种类繁多，

反映出国际中文学习市场的细分化趋势以及教材资源开发的多样化特点。有数据为证——1949 年到 1960 年，共出版国际中文教材种类达 104 种，2011 年到 2020 年这一数字达 8039 种，增长约 77 倍。这其中，为满足区域国别化需求开发的本土中文教材，为满足不同学段、年龄需求开发的分级教材以及为满足专业、职业需求开发的“中文+”教材等，均有效满足了教学需求(人民网, 2022)。因此，在教材中加入母语内容、文化多样性以及去意识形态化等元素，以支持超语教学法的实施，让教材更加“本土化”尤为重要 (Yasasri, 2024)。

### 文化理解和语言政策的研究

超语的社会文化研究大多是以不同国家或地区展开的实证研究，超语社会文化的研究从国家意识、语言意识、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等方面展开，以跨语言教学为代表内容。跨语言教学是指，强调个体在沟通中主动部署所有符号资源以构建意义，突出语言作为交流的整合性工具。这一理论在双语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中文词汇教学中应用非常广泛。双语教育项目，尤其是涉及英语和其他非主流语言（如普通话）的项目，如何支持少数语言学习者获取学校语言的知识等(Li & Liu, 2021)。

语言政策在双语教育中的实施，包括对语言分离政策的挑战 (Li 2024)，以及如何通过跨语言教学实践来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文化理解，研究双语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混合、借用和结合不同语言的特征来索引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身份和立场。我们完全有可能设计出一套包含不同语言的不同言语部分的测试（如给学生汉语的名词，泰语的形容词），并要求学生用两种语言来进行造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句法结构的调适 (Cenoz & Gorter, 2011)。通过多模态教学方法，如结合视觉、手势、语言元素等，促进学生对语言的深层理解和记忆，通过对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认知处理研究，提高词汇记忆和理解的影响 (Tian, 2024)。超语以关注社会交际活动中语言和非



文量显著增加，2019 年和 2020 年每年有 2 篇，2021 年达到 8 篇，这一时期的增长表明超语理论在汉语教学领域的应用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研究者开始从多角度探讨其在教学实践和理论发展中的作用；4)快速增长期(2022-2024)，这一时期发文量迅速增长，2022 年达到 13 篇，2023 年有所下降至 8 篇，但 2024 年激增至 17 篇，这一显著的增长反映了超语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扩展。

### 发展前景

关键词共现频次突增是一个研究领域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往往反映了研究者的兴趣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学科研究前沿的重要标记，通过提取一段时间的突增关键词生成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来显示关键词突现的时间变化，是学科研究前沿的重要标记之一(Chen, 2004)。CiteSpace 通过提取一段时间的突增关键词生成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来显示关键词突现的时间变化。图 5 中红色线条表示突然发生显著变化的时间区域。

**Top 1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4 - 2024
bilingual education	2015	0.69	2015	2015	
diasporic community	2018	0.69	2018	2018	
language choice	2019	0.69	2019	2019	
chinese language arts	2022	0.61	2022	2022	
language allocation policy	2022	0.61	2022	2022	
participatory design research	2022	0.61	2022	2022	
dual language	2022	0.61	2022	2022	
mātauranga māori	2023	0.61	2023	2024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2023	0.61	2023	2024	
digital multimodal composition (dmc)	2023	0.61	2023	2024	

图 7. 关键词“突增”网络图谱

图 7 列出了 10 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都有一个对应的年份，表示该关键词在那一年的引用突增最为显著。2015 年-2019 年，突增关键词不多，主要有 bilingual education(双语教学)、diasporic community(散居社区)、language choice(语言选择)。从 2022 年开始（含 2022 年），

超语突现词发生变化，主要有 language allocation policy(语言分配政策)、Participatory design research(参与式设计教学研究)、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跨文化理解)等。可以看出超语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研究中关键词突现的强度值大约在 0.61 到 0.69 之间，大多数关键词的突增是单年的，即开始和结束年份相同，而“maturanga māori”、“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和“digital multimodal composition (dmc)”的突增持续到了下一年。关键词突增变化表明了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超语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点随时间的演变，这些突增的关键词代表了在特定年份中，学术界和社会对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关注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教育、政策和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关键词，如“digital multimodal composition (dmc)”和“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在 2023 年突增，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领域是新兴的研究领域，或者是在那一年有重要的研究进展或政策变化。

### 结论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呈上升态势，由于起步晚，发文量少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超语理论在双语、多语、以中文为二语/外语/传承语教学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在理论研究、教学实践、教材开发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研究趋势的动态性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议题和方法都在不断更新。研究者需要保持对最新研究动态的敏感性，并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和方法。通过对超语在汉语教学领域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对多语言资源整合使用，促使教师更新教学理念，从单一语言教学转向多语言、多文化的融合教学；根据学生的多语言、多文化背景，实施个性化教学，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教学效果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Alam, 2023)，增强汉语学习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数据库之间的不同，虽然提供了关键词突增的数据，但没有提供相应的图表或图形来直观展示这些关键词在不同年份的引用情况，可能影响数据变化趋势的理解。虽然对关键词等进行了基本的解读，但是缺乏深入分析，没有探讨这些关键词突增背后的具体研究或趋势。

### 致谢

本研究受以下基金项目资助：湖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基于活动理论的国际中文教师超语行为研究”(XJ2024004502)；202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多语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24D014)。

### 参考文献

- [1] Alam, M. B. S. (2023). Acculturation of Java and Chinese Cul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1), 1-14.
- [2] Cenoz, J., & Gorter, D. (2011). A holistic approach to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troduc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5(3), 339-343.
- [3] Chen, C. (2004). Searching for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s: progressive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1(suppl 1),5303-5310.
- [4] García, E. E. (2005).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wo languages: Bilingualism &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5] García, O., & Beardsmore, H. B. (2008).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Wiley-Blackwell
- [6] García, O., & Kleyn, T. (2016). Translanguaging with multilingual students. *Learning from classroom moments*. London: Routledge.
- [7] Lewis, G., Jones, B., & Baker, C. (2012). Translanguaging: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from school to street and beyond.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18(7),641-654.
- [8] Li, C., Chen, L., Ma, C., Zhang, S., & Huang, H. (2021). Strategy Use amo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Medi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12,752084.
- [9] Li, S. S. (2024). The Application and Challenge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Under The

-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2), 144-154.
- [10] Li, Y., & Liu, J. (2021). Translanguaging as a pedagogical practic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inter) culture course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56(2), 89-117.
- [11] Song, Y. (2024). Translanguaging as sociolinguistic infrastructuring to foster epistemic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medium-instruction degree programs in China.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15(4), 1407-1431.
- [12] Swain, M., &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2(3), 320-337.
- [13] Stephanie, P., Juariah, N.S., Maela, V. (2022). Literal Translation of Sclerometer User Manual from Chinese to Indonesia.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2), 42-52.
- [14] Swain, M. (2006). Linguaging, agency and collaboration in advanced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dvanced Language Learning: The Contribution of Halliday and Vygotsky*. <https://doi.org/10.5040/9781474212113.ch-004>
- [15] Tian, J. (2024). Co-constructing translanguaging space to facilitate participation in a novice CFL classroom.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15(2), 188-217.
- [16] Yasasri, N. S. (2024).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And Recontextualizing Learning Material: A Corpus-Based Study of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Used in Sri Lanka. *LLT Journal: A Journal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27(1), 498-516.
- [17] Yue, M. (2024). An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Model of "Listening, Speaking +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Chinese Students of Chinese Descent.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2), 170-189.
- [18] Zhang, Q., Osborne, C., & Lin, X. (2024). Translanguaging learning strategies (TLS) A novel proposal from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15(2), 218-243.
- [19] Zhao, N. (2022). The Research of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to Ethnic Chinese Children.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2), 83-90.
- [20] 韩艳梅.(2020).跨言用研究的理论、实践与启示.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26-32.
- [21] 李泉.(2021). 再论汉语国际化规划. *语言教育*(04),77-84.
- [22] 李崑,沈骑.(2021).超语实践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4),2-14.
- [23] 李宇明.(2023).语言是文化的鸿沟与桥梁.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34-42.
- [24] 李雨彤,彭美淇.(2023).从二语到三语到跨语言:当代超语教育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基于 SSCI 期刊的分析.(eds.)2023 对外

汉语博士生论坛暨第十六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pp.147-157).

- [25] 梁端俊,王平.(2020).超语缘起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探究.*外语电化教学*(2),86-92.
- [26] 卢淑芳.(2014).论国际汉语教师的教师意识.*语文建设*(12),60-61.
- [27] 罗琬昕.(2024).“语言匮乏”:超语转向下的语言治理.*学习与实践*(7),133-140.
- [28] 王俊菊,陈伟红.(2022).超语行为研究的理论取向与哲学溯源.*中国外语*(3),69-76.
- [29] 吴英成,邵洪亮.(2014).华裔汉语学习者解读:新加坡视角.*世界汉语教学*(2),253-262.
- [30] 许红花.(2024).基于知识图谱的超语研究可视化分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05-111.
- [31] 袁妮娅,周恩.(2015).超语言技能:概念、理论机制与研究进展.*外语界*(2),7-15.
- [32] 赵焱,张旗伟,徐蕊,张玮.(2021).超语及认同建构作为双语者的学习手段.*现代外语*(2),258-270.
- [33] 赵应吉,董保华.(2022).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2015—2021).*外国语文*(6),129-139.
- [34] 郑咏滢,安宁.(2022).超语研究十年回顾:理论、实践与展望.*外语教学*(5),1-7.